

中国
文化
知识
大观
园

科技军事卷

辽海出版社

兵书通览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 • 科技军事卷 •

兵书通览

(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目 录

一、先秦兵书	(1)
《六韬》	(1)
《阴符经》	(8)
《老子》	(10)
《墨子》	(11)
《管子》	(15)
《商君书》	(16)
《韩非子》	(18)
《荀子》	(19)
《鬼谷子》	(19)
《孙子兵法》	(20)
《吴子》	(26)
《司马法》	(31)
《孙臆兵法》	(36)
《尉繚子》	(48)

二、秦汉三国兵书	(54)
《黄石公三略》	(54)
《新书》	(66)
《潜夫论》	(67)
《淮南子·兵略训》	(68)
《素书》	(71)
《将苑》	(73)
《便宜十六策》	(77)
三、唐宋兵书	(79)
《李卫公问对》	(79)
《太白阴经》	(84)
《李靖兵法》	(88)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90)
《长短经》	(91)
《百战奇法》	(92)
《百将传》	(97)
《武经总要》	(101)
《武经七书》	(106)
《虎钤经》	(110)
《何博士备论》 ^①	(111)
《权书》	(113)
四、明清兵书	(115)
《阵纪》	(115)
《兵法百战经》	(120)
《三十六计》	(122)
《练兵实纪》	(127)
《兵机要诀》	(132)

《海防图论》	(135)
《武备志》	(137)
《草庐经略》	(146)
《投笔肤谈》	(147)
《武编》	(149)
《兵经百篇》	(164)
《曾胡治兵语录》	(168)
《乾坤大略》	(172)
《兵谋与兵法》	(176)
《防守集成》	(178)
五、近现代兵书	(182)
《国防论》	(182)
《国防新论》	(185)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88)
《论持久战》	(190)

一、先秦兵书

《六韬》

《六韬》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旧题周吕尚撰。吕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为周初军事家、谋略家。然而，“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章学诚《文史通议·诗教上》）。就是说周初尚无出现个人著述，所以《隋书·经籍志》题“周文王师吕望撰”，显系托名。它的真正作者已不可详考。但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道家类，“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和其内容“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朱墉《武经七书汇解》）而又多史实记述等方面推测，它很可能出自后世史官们的手笔。

关于《六韬》的成书时间。由于原书作者姓氏失传，对于它是不是一部先秦兵书乃至具体成书时间也就引起了后人的种种猜测。自北宋何去非首先提出对《六韬》怀疑之后，南宋叶适遂判其为伪书。此后，宋明以来的学者群起而应之，南宋的黄震，明代的宋濂、胡应麟、焦肱、张萱，清代的姚际恒、姚鼐，近代的梁启超，现代的黄云眉等均断定《六韬》为伪书。究竟伪在何时，也有不同意见：一为周末说，“《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卫应麟《困学记闻》卷五）；二为楚汉说，“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张萱《疑耀》卷二）；三为汉以后说，《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梁

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四为魏晋说，“考《汉志》有《六韬》，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京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胡应麟《四部正讹》）。70年代初分别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南北两地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据专家们考证，这两座汉墓的埋葬时间，前者至迟在汉文帝即位之前（前179年），亦可能在秦楚之际（前209～前203）；后者断为汉宣帝王凤三年（前55）。很显然，简书书写年代应在埋葬之先，而成书年代又必定在书写年代之前；既然埋葬年代为汉初或秦汉之际，那么上述所谓秦汉以后伪撰的说法不攻自破，《六韬》为先秦兵书便确定无疑了。具体成书于先秦的哪个时期，这是汉简所没有解决的。近年发表了一些考据文章，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春秋说，认为《六韬》“著作的时代大抵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时代”（宗彦群《从临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看秦始皇“焚书”、的革命措施》，《文物》1974年第3期）；一是战国说。笔者认为战国说较合情理，其理由是：（1）《六韬》开始杂取儒、道、法、墨等家的思想，这种各家思想开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趋势，只能发生在战国以后，不可能在春秋之前。（2）《六韬·武韬·兵道十六》引有“黄帝曰”，黄帝的传说最早出现于《左传》、《国语》、《逸周书》，这三部古籍均为战国时作品，尽管所依据的材料可能会早一点，但黄帝的传说流行却在战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所以，引用黄帝之言的书只能在战国以后。（3）《六韬》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骑兵部队的编制、骑士的选拔和骑战战法，其最高战术单位是二百骑，车骑比例是一比六或一比十，主要任务是邀敌、追击、奇袭和骚扰敌人等。这些情况既不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也不可能是汉以后的情况，因为汉时骑兵已跃居于诸兵种的首位，韩信破赵时用骑兵二千名；文帝时一次出征动用骑兵十万



《六韬》书影

名，车骑比例达一比一百。所以说《六韬》反映的骑战只能是战国时的情况。(4)《六韬》中的“避正殿”、“将相分职”、“万乘之主”、“百万之众”等内容都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

关于《六韬》的著录。以往一般认为《汉志》无《六韬》，《隋志》始著录；或谓《汉志·儒家类》之《周史六搜》即今本《六韬》，这是不正确的。《汉志》著录有《六韬》，但无《六韬》之名，它包含于道家类《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即其中的《兵八十五篇》。《汉志·兵书类·兵权谋》下的注释说“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鹃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出司马法人礼也。”这就是说，太公的论兵著述已著录于《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兵书类省略不录。《六韬》系道家之流所为，内容亦多言道，《汉志》将其归入道家类是理所当然的。《太公兵八十五篇》何时以《六韬》之

名行世？有人据《庄子》中“从说之则以《金版六摶》”断为战国时已有《六摶》之名行世，看来证据不足。《史记》称《太公兵法》，《汉志》称《兵》，两地出土的汉简均有篇题名称，而均未见《六摶》之名。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六摶》之名的文献是《后汉书》和《三国志》，其中有：“《太公六摶》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后汉书·窦何列传》）“善诵《太公六摶》。”（《后汉书·徐璆传》及《左雄传注》）“宜急读《孙子》、《六摶》、《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由此推知东汉以后《六摶》之名才开始流行，到唐魏徵等编《隋志》时首次在书目中著录为《太公六摶》，后世相沿至今。

关于《六摶》的篇目。《汉志》著录《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删定的“武经”本《六摶》共六十篇，二者相差十五篇。现在所能看到的两种汉简本和唐写本残卷中的篇题和内容，即有与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题，如汉简中的《葆启》、《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三十》，唐写本中的《利人》、《趋舍》、《礼义》、《大失》、《动应》等。这些与今本不同的篇章内容当是六十篇之外的十五篇内容，或者为流传过程中失传，或者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

今本《六摶》共六卷六十篇：

《文摶》：文师第一、盈虚第二、国务第三、大礼第四、明传第五、六守第六、守土第七、守国第八、上贤第九、举贤第十、赏罚第十一。

《武摶》：发启第十二、文启第十三、文伐第十四、顺启第十五、兵道第十六、三疑第十七。

《龙摶》：王翼第十八、论将第十九、选将第二十、主将第二十一、将威第二十二、励军第二十三、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军势第二十六、奇兵第二十七、五音第二十八、兵徵第

二十九、农器第三十。

《虎韬》：军用第三十一、三阵第三十二、疾战第三十三、必出第三十四、军略第三十五、临境第三十六、动静第三十七、金鼓第三十八、绝道第三十九、略地第四十、火战第四十一、垒虚第四十二。

《豹韬》：林战第四十三、突战第四十四、敌强第四十五、敌武第四十六、乌云山兵第四十七、乌云泽兵第四十八、少众第四十九、分险第五十。

《犬韬》：分合第五十一、武锋第五十二、练士第五十三、教战第五十四、均兵第五十五、武车士第五十六、武骑士第五十七、战车第五十八、战骑第五十九、战步第六十。

《六韬》：“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内容非常丰富。《文韬》主要讨论了治国用人的政治战略；《武韬》着重论述了如何用兵的军事战略；《龙韬》阐述了军队的组织、奖惩、将帅的选拔和修养、军事秘密通讯、奇兵的运用、侦伺敌军的方法以及兵农合一的思想；《虎韬》主要讨论了各种特殊天候、地形及其他不利条件情况下的进攻和防御战术，并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种类、形制、配置、作用和一般布阵原则；《豹韬》主要讲述森林、山地、河流、险隘地区作战和防敌突袭、夜袭以及遭遇战的战术。《犬韬》主要论述了军队的指挥调动，击敌时机，练兵方法，步、车、骑兵的组织、协同和各自的战法。

《六韬》继承了它以前的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思想内容很丰富。在政治战略思想方面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复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重民”、“利民”，认为天下是属于民众的，因此“取天下”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强调“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要使“万

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善于不争”，“削心约志”，其实质是轻徭薄赋，要求君主清静寡欲，不与民争利，“无取民者，民利之”，最后达到“取民”的目的；“上贤下不肖”，认为“上贤下不肖”是治国之要道，具体阐述了举贤的标准和方法，明确指出了不能重用的十三种奸人，即“六贼七害”；“赏罚必信”，认为“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提出了“杀贵大，赏贵小”的重要原则。

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己知彼”，“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司令部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办法，即所谓“八徵”。

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依托鬼神，以惑众心”。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极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命题，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

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以折，太张必缺，攻强以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六韬》在国外颇受重视。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就曾把《六韬》与《三略》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有关书目记载日本研究译解《六韬》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种。西方第一次翻译的中国兵书共四种，合称《中国军事艺术》于1772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六韬》就是其中一种。此外朝鲜、越南等邻国也相继出版和翻译了《六韬》。

《六韬》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它不仅文武兼备，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六韬》也有许多糟粕，如《兵徵》中的“望气”是一种迷信方术；《文师》中的“钓饵”之术表现了剥削阶级的偏见；“明主”、“贤将”决定社会发展，是唯心史观的反映，等等。

《六韬》的版本源流比较复杂，各本内容互有异同，从现存版本看，大致有以下四个系统：（1）竹简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六韬》残简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太公》残简，这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来，有文物出版社铅印本。（2）唐写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韬》残卷，共存二百零一行（其中一行只残存半个字），二十个篇目。原件藏法国巴黎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纸写本《六韬》。（3）《群书治要》本，是唐魏徵给唐太宗编的摘要本，只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的内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韬。以上三个系统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些不见于今本的佚篇或佚文。（4）《武经七书》本，初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

年)，现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国内有其影印本即《续古逸丛书》本。明清以来众多的丛书本及其注释本、白文本，大都属于这个系统的版本。

《阴符经》

《阴符经》又称《黄帝阴符经》。旧题黄帝撰，伊尹、太公、范、鬼谷子、张良、诸葛亮等注。此书出现于唐代，最早记载见于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木部》；最早著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但它的作者及成书时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尚属悬案。关于作者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黄帝撰、战国山林之士撰（见《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庐陵黄瑞节附录》）、晋杨羲撰（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道家类·阴符经解》）、北魏寇谦之撰（见唐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唐李筌撰（见宋黄庭坚《山谷题跋·跋翟公巽所藏石刻》和宋朱熹《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关于成书时代主要有商末说、周末说、战国说（见《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庐陵黄瑞节附录》）、战国末说（见清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阴符经》）、东汉末说（见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阴符经》）、晋说、北魏说、唐说（后三说·见上文注）等。近年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家，一是王明的东晋说，认为成书于东晋以后，约在公元531年至580年期间（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二是李养正的战国末年说，认为此书是以黄老学说为理论基点，在政治、军事思想方面的运用和发挥，是战国时期激烈的斗争形势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它可能成书于战国末期（见《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阴符经》）。

《阴符经》，自李筌始为其作注以后，历朝为其作注的都很多，宋郑樵《通志》著录的各种本子有三十九部，明《道藏》

中注本有二十四种，明代吕坤说：“自有《阴符》以来，注者不啻百家”（《注阴符经题辞》），到清便更多了。有的从道家、兵家角度注解，也有的从儒家、佛家、纵横家、医家、阴阳家、道教等角度注解。所以，古籍书目中往往道家、兵家等类同时收录此书。

《阴符经》一卷，共分三章（一本作上、中、下三篇）：一、《神仙抱一演道章》，二、《富国安民演法章》，三、《强兵战胜演术章》。第一章主要内容是论说天道与人事、政治的关系。第二章主要内容是阐述以自然天道为法则，乃可富国安民的道理。第三章主要内容是论兵的，讲主事专一精神；守时机；不为声色所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明了事物变化之理，掌握应变之术，天道、人事相参验，随机应变等。

《阴符经》是一部论述王政和军事的著作。本文仅对其军事思想作一简单介绍。书名“阴符”概括了全书思想内容的核心。什么叫“阴符”，李筌解释说：“阴，暗也。符，合也。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故曰阴符”。（《阴符经疏》）意思是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策略计谋必须暗合于自然天道。它认为统治者处理政事、指挥打仗要仰观天象、掌握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要“知之修练”，修德练武，内辨忠奸，外御强敌，国家便可巩固。它认为用兵若能做到精力专一，用己之长，就能事半功倍。指出：“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这是借瞽聋之短长比喻用兵也要培养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便可获十倍甚至万倍之利。它主张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天之无恩，而大恩生”，对国家实行无为而治。而用兵必须以奇取胜，“迅雷烈风，莫不蠢然”，意思是阴阳激搏而生迅雷烈风，其势猛烈，万物莫不惊惧而蠢然若呆。这是用自然界的声势来比喻以奇用兵之势。它还主张要正确使用恩赏。认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意思是说有

感恩戴德的君子，也有以怨报德的小人。因此，对于思赏要慎重，君主赏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

《阴符经》在哲学上的成就是较为突出的。它以自然天道观否定了天命论；在社会变化动因上，既肯定了“天道”的影响，也注意到了人的作用，提出了“天人合发”的论点；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变与定、巧与拙、生与死、恩与害等，无不相反相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转化。

历史上对《阴符经》的评价有毁有誉，但大都失之偏颇。我们既不同意把它神秘化，也不同意把它贬得一无是处。它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和军事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如唐代李筌、明代吕坤等进步思想家就受过很大影响，李筌《太白阴经》中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军事辩证法就源于《阴符经》的天道观和朴素辩证法思想。

《阴符经》行世后为其作注和翻刻者日渐增多，出现了三百字本、四百三十七字本等内容有差异的不同版本。注本中以唐李筌、张果；南宋朱熹、俞琰等注最有影响。现存各注本大都被收进丛书，比较重要的有：道藏本、四库全书本、广汉魏丛书本、说郛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子书百家本、宛委别藏本、墨海金壶本、道书全集本、兵垣四编本等。另外也有单行本行世，如清乾隆壬辰（1772）年林笏堂刻本、清道光壬寅（1842）年静观堂刊本、清光绪丙申（1896）年大梁奇文斋重刻本等等。

《老子》

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老子》一书是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老聃学说的实录和发挥，其书奠基于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于战国初年。此外，也有主张老子是战国时代人者，甚至有成书于秦汉之际的说法。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于历史

的实际。

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生活的时代略早于孔子。曾在周朝做过管理图书的史官，后因不满于当时动荡变革的社会现实而悄然退隐，不知所终。

《老子》，又名《道德经》，是道家的主要经典著作之一。分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两个部分，共八十一章，约五千字左右。从根本上说，《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主要研究社会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但也有相当篇幅的论兵内容。特别是该书多从考察历史和战争的角度来揭示其哲学命题，故所论往往对军事领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唐人王真在所著《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中曾说，《老子》五千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

《老子》的军事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兵者凶器”的战争观。早期道家通过对历史上兴亡更替的深刻考察，充分认识到战争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进而在一般的意义上对战争持反对态度，这在《老子》一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老子》主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与其清静无为的政治立场是相一致的。

二是守柔贵雌、以柔克刚的战略思想。《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即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而在矛盾的统一体中，柔弱虚静的一方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制约着刚强动躁的一方，因而主张贵柔守雌，以退为进。这一“柔弱胜刚强”的刚柔论思想体系客观上为弱小的新生的力量战胜强大而腐朽之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传统战略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墨子》

《墨子》是战国显学墨家学派的论文集，未必尽是墨子

自著。

墨子，名翟，战国时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

据孙诒让考证，墨子生卒年在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他出身低微，“上无君子之子，下无耕农之难”，可能是一个接近手工业劳动者的读书人。因而养成了注重节俭、劳身苦志的作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足登“跋蹀”。他注重实践，善于制作，相传他的木工技术，与鲁班齐名。在学术上，初受孔子影响，“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逐渐成了孔子和儒家叛逆，创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儒和墨两派互相驳辩，在先秦首先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人们常把孔墨、儒墨并提。墨子在战国时代乃是流誉四方、最具影响力的大思想家之一。墨家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自己使命，并为之孜孜奋斗，游说诸侯，谋求制止战争，安定社会，安定民生。墨子“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诒让《墨子传略》）“席不暖”，“衣不黔”，真有孟子所说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主”的精神。两千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他止楚攻宋的传说。正因如此，他的智慧、坚定和见义勇为博得了历代人民尊敬。鲁迅根据《公输篇》写成了著名小说《非攻》，再现了墨子的传奇形象。

到了汉代，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墨家学派渐趋式微。但体现墨家思想精华的《墨子》一书得以保存下来，并一直流传至今。《墨子》的主要版本有：①汉秘府藏竹简原本七十一篇（今不存）；②汉魏间改写古卷本（今不存）；③隋唐卷子本（今藏于日本宫内省）；④宋刊本；⑤明正统十年刊道藏本（五十三篇，今藏于北京白云观）；⑥明唐尧臣刊本；⑦清毕沅乾隆四十八年校刊本。《墨子》一书由历代墨者薪尽火传，一再加工整理